



一. 序言

尽管发展初期条件欠佳，可是今天的瑞典已变成了一个贫困被消除并代之以领先科技的高福利国家；尽管人口很少，可是它却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领跑者。今天，这个国家已经健全和完善了各种制度，从而使它建立了一个和平相处和政治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可以解决分歧与冲突和具有共识的社会，一个关爱老弱病残和充满同情心的社会，以及一个实行柔性经济政策的社会。

自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尽管这个国家早期采用的是相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然而在1978年，它实行了市场体制的改革并逐渐地实施了自由经济政策。所有这些改革成果令人注目。虽然贫穷仍普遍存在，但极度的贫困却显著地降低了。人们可能想知道正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是否能借鉴瑞典的发展经验。

与瑞典在1870年走上发展道路时的情况非常相似，就全球先进的科技而言，中国还很落后。在发展战略方面，至少在现在的初始阶段中国还是追赶者而不是领跑者。换句话说，中国目前主要还是要借用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而不是单纯依靠自主创新。在追赶过程中，中国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有这样一套能一直维持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体系。如果各项制度有益于创新活动和生产力提高的话，那么现在的发展趋势就会长久地保持下去。

二. 瑞典模式的出现

1870年左右，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瑞典相对落后。从那时开始，它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提高。从1870年到1970年，瑞典与日本一道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均年收入增长2.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快速的的增长是追赶的结果。到了1970年，瑞典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微乎其微。瑞典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只是在以农业为发展中心的年代一直未被利用。当工业化来临之际，这些资源成为了增加国家出口收入的保障基础。瑞典之所以能够赶上不仅仅是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为国民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十九世纪末，瑞典在科技上有了突破，意味着在全球市场的某些领域中瑞典的企业占据了领导地位。

要维持如此长久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带来结构上的改变，同时还需要增强生产力和活动效率。在结构性变化方面，瑞典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十九世纪中期的80%降到了现在的1%。在此期间，虽然大部分的增长要归咎于劳动力由低效型向高效型的转变，可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效率对长久发展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基础建设和完备的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助于投资、相关知识和技术的给予和应用以及市场发挥有效的作用。瑞典在制定保障其改革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方面一直是卓有成效的。

三. 瑞典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

长久以来，瑞典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实行“积极稳定政策”。它始于1932年。当时瑞典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制定了扩大就业、反对失业的经济政策，劳动人口的全部就业成了战略的核心目标。二战后的头十年间，失业率处于2%~3%之间。现在，这种想很好地协调经济运营的雄心大不如前了。

尽管具有社会主义的烙印，瑞典政府对经济运营所持的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态度”。瑞典模式并非意味着经营的大型国有化，而是对企业主收取瑞典式的高税收。当国家将所得的这些收入进行再投资时，那些企业主实际上所缴纳的税收是很少的。

“行业工会的作用和劳资双方的关系”是这一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尽管早期发生了无数次的罢工，但从二十世纪30年代起瑞典已营造了和谐的劳资间的关系。行业工会非常普遍化，并且薪金谈判的集中制使得和平地和全面地解决劳资纠纷成为了可能。瑞典曾经试图由国家制定指导性收入政策，但遭遇到市场参与者们的反对。因此薪金基本上是由劳资双方自由商定。

“市场介入”的程度和范围依行业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就劳动力市场而言，通过导入增强流动性的措施，如劳动力的转移和对流动的补助等，使劳动力市场健康地运转。然而，在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政府介入的程度和范围是很高和很广的。银行被硬性规定要购买政府债券或投资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领域有着与之相关的指导性投资政策。

瑞典非常青睐“自由贸易政策”。自从实现了自由贸易以来，瑞典就不断追求。因为作为一个小国，会因贸易保护主义而损失很多。瑞典至今还没有国内贸易的立法，可是它却运用自由贸易作为补充规定。当外国商品通过价格审查，国内企业不能从事国内垄断。

“福利社会”的构建包括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首先是要建立广泛的由税收资助的公共服务机构，如教育和卫生等；其次是要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福利社会”体系是在收入和消费间实行平等，因此税收水平非常高。在瑞典，从二十世纪60年代实行覆盖范围很广的间接税收以来，还有征收很高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企业所得税。

“社会氛围”是动态的变化被接受的总结性概况。在某种程度上，福利社会的“社会氛围”所要依靠的是良好的就业前景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在瑞典模式最辉煌的时期，由于与行业工会保持了密切合作，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政府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当这一模式遇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失去了领导权并从那时起自由保守的反对派数次执政。无论怎样，政治集团间有着广泛的政治共识，并且人们会注意到即使是右翼政党执政，也保留了福利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瑞典，虽然对市场问题的解决处于不断增强的开放趋势，但是在这方面的改革大多是由社会民主党政府实施的。似乎可以公平地讲，所有的政治党派（除了旧的共产党，现在叫做左派党和绿党外）都亲近中间选民。

四. 瑞典模式的衰退

随着1973~1974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瑞典模式遇到了问题。瑞典采取了加剧内外宏观经济失衡的“弥合政策”，而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却没有。虽然瑞典推迟了调整应有的阵痛，但与其它可比国家相比，经济的长期增长衰退的更多。随着缓慢的增长和试图维持就业水平，瑞典重新增加了外债。根据这次教训，瑞典模式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其中，一种支持结构性转变的缺乏灵活性的结构模式已经出现来代替旧有的模式。可制定的相关政策却阻碍了市场有效地发挥作用；感觉上对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作

用并不充分。

二十世纪80年代，瑞典模式中的一些部分被逐渐地废除。相关的改革开始于货币严重贬值的1982年。这一情况意味着公众外债的增加和实际利率的剧增，导致了对公共事业投入的减少。公共事业方面的就业机会再也没有增加。国家还不得被迫减少对基础建设的投入，这与此前其他时期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完全不同。原有的薪金商谈机制改变了，并且信贷市场也放开了。薪金的暴涨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管制的解除导致了信贷的泛滥和资产的暴增。这一情况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资产价值暴跌时才结束。1992年，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了对货币的保护，让它自由流动。整个金融市场为之震惊，纷纷紧缩银根。许多企业因此而倒闭，失业率也达到了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新的通货膨胀标准开始实施于二十世纪90年代。新标准规定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薪金的商谈变得温和而且企业利润也增加了。由于竞争力不断增强，瑞典的贸易有了顺差，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金融情况明显好转。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贸易顺差增长非常快。

对体制的改革虽解放了体制本身，但瑞典还是福利制国家，而且社会保障机制仍然很强。社会和政治气候很和谐，劳资双方的关系也十分良好。在瑞典，对体制不但可以进行改革，而且能够允许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好象福利国家的要素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保留。福利的体制可能会出现其它的形式，但瑞典似乎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

五. 瑞典模式与中国经验的相关关系

- 柔性经济和市场整合的重要性

瑞典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在结构和政策上的灵活性是至关重要的。劳资双方都对瑞典融入国际经济持积极的态度，并肯定和接受了行业为增强竞争力进行的合理性的调整和结构性变革。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进入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向来是而且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加入世贸组织只是迈向与国际市场整合道路上的第一步。

- 界定政府的职责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瑞典是除日本外政府介入程度最高的国家。可是，政府对介入非常谨慎以保证市场不被打乱，确保生产力的提高。

瑞典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摆脱了二十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的困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是 Keynes 政策的结果，可是更大程度上是瑞典在1931年维持了金价标准并将货币大幅贬值。这一做法保证了在随后的十年里瑞典出口商的竞争优势地位。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情况与以降低汇率来保证竞争优势（对竞争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今日中国的情况类似。

就生产活动介入而言，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利用相对的优势最快地为福利社会创造财富。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将得到发展，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将会衰退。所谓的“统一薪金政策”即在所有行业间实行同等的薪金，对结构性变革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些不堪重负的企业可能会被淘汰，而那些实际上赢利的企业受到了劳工方的追捧。

- 管理的问题和法律的作用

在瑞典，民主制度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渐渐形成。直到1920年左右当妇女有了投票权时，包括瑞典在内的许多国家才实现了全面的民主。当然，为此发生了多次的政治冲突与纷争，可都在共识和务实下被很好地加以解决了。

瑞典社会的其中一面是有着广泛的社会组织网络体系。这些体系很久以前就在农村地区存在。但到了工业化阶段，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政治党派和团体、工会组织、提倡戒烟酒的组织、独立的教会和运动俱乐部等。瑞典可能是通过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间广泛和平等的交流而达到建立彼此信任的这种组织文化方面的最好的典范。因此，要在中国建立信任需要允许独立性组织的出现。但这好象不是政府有意要做的事情。

党派之间就协议进行商讨一直是项传统。在政府实施新的法律前通常是与受邀的有关党派举行会议，起草报告分发给议会内外的所有利益党派和团体征询意见。在将议案提交给议会前，政府会深入听取和参考这些意见。这种建立共识的做法好象与中国政府的做法十分不同。

- 福利社会的根本——社会保险、社会包容和对冲突危机的管理

在瑞典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即福利社会是阻碍了还是有助于结构性的变革。后者论辩基于的认识是：如果你得到基本的保障，你就会愿意接受变革。因为你知道这种保障不会使你陷入贫困。当然，这种制度体系还保证当调到新企业或从事新行业时，如果你做的好的话，会挣到大约同样的薪水。福利社会的这种做法是否比其它的消极的做法好还很不好说。

中国无法提供这样的坚实的保障。但在中国，劳动者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未来充满的信心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接受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革。政治信任必须建立在地方政治进程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在这方面中国和瑞典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 有利于私有企业发展的环境——财产权和管理制度

总的来说，瑞典政府一直是扶持私有企业的。我们注意到，为私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的财产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明确地确定下来了。在中国，国家仍然掌控着大部分的经济，并进行着各式各样的、特别是非市场化的介入。中国国有企业的境遇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应该借鉴瑞典的经验，减少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和介入。

在瑞典，司法机关一直是独立的。并且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它可以非常有效和中立地处理企业间的法律纠纷。以破产法为例，一部有效的破产法是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体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给我的印象是似乎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在诸多要搞明白的问题中的一个就是尽管产权不明，可是怎么会吸引如此大量的外来投资以及经济发展会如此之快。除非对它实行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改进，我猜疑它最终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在广泛领域成为世界的领跑者，但很显然它会快速地拉近与世界的差距。当工资和其它成本上升，为保持快速发展就需要加入创新与发明的行列。这需要良好的科技教育来保证。在瑞典，对科技的兴趣一向很高，而且后学校教育通常会提供良好的技能培训。在中国也该如此。吸纳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和信息将会缩短中国攀登世界顶峰的路程。信息非常容易被获取且没有地缘劣势。而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比

如试图控制互联网)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只要人们看到收入增加且光明的就业前景,中国现阶段的结构变革可能就会被接受。可是一旦经济发生停滞,不满就会出现。由于无法通过工会组织进行沟通,也没有反对党派,不知道抗议会以何种形式出现。

六. 结论

在中国运用瑞典模式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局限性是两国间在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当瑞典的经济与今天的中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时,瑞典的福利型社会提供非常有限的安全保护网。对资源有限的中国而言,与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险相比,将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教育以及所需的基础设施放在优先地位显得更为明智。当然,有些形式的社会保护措施也是很必要的。

我们看到,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转移,瑞典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变其资本与劳动力间的比率。可在当今世界,要期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劳动力敞开大门实在是太难了。尽管国际资本丰富而且中国的吸引外资非常成功,可是在投资者看来,中国只是目前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稳定时期;而像在瑞典发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人们富裕起来,民主改革在所难免。因此,这些压力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增加。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何面对它以及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严峻考验。

作者: Prof. Arne Bigsten 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系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 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 敬请注明: 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